

论世界华人文学的跨国主义批评建构

朱骅 黄旭

摘要：社会科学界针对 21 世纪因互联网与便捷交通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移民新特征，提出跨国主义理论。该理论对文化平等观、流动性以及网络型研究方法的关注，对以跨国性为根本特征的世界华人文学研究具有借鉴意义，有助于学界从世界发展的现实状况关注华人文学叙事空间的世界性流转和弹性文化认同，有效回应全球化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版图重绘，有利于推动世界华人文学多语种文学作品间的比较研究，建立跨国的研究网络。世界华人文学的跨国主义建构有助于充分体现这一学科的全球视野与现实关怀。

关键词：世界华人文学；跨国主义；跨国空间；弹性公民身份；文化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677(2024)6-0005-11

世界华人文学是独特的多语种文学，在文化呈现、叙事空间、传播方式、政治关注等诸多方面既超越了中国也超越了作者移居国的地理版图。随着 21 世界全球资源配置的变化，人口流动加快，越来越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华人既用汉语也用移居国的语言创作，作品中的文化图景更加复杂丰富，文化间的融合与相互增益越来越明显。然而学界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在数十年内却没有明显变化，以作品数量最为丰富的美国华人文学为例，当下的研究基本可以归入离散与后殖民主义批评，譬如故土情怀、无根漂泊、文化冲突、种族歧视、东方主义、身份认同、第三世界女性境遇等。这些研究所采用的视角、方法和 20 世纪产生的文本较为契合，但随着 21 世纪通信与交通技术的发展、移民政策的调整以及移民外语水平的提升，之前移民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已不复存在，很多人可以自由选择对其职业发展或生活方式最适合的移居国，与国内亲友保持实时通讯联系，国籍身份可以与文化认同不一致，可以与经济来源不一致，因此对

世界华人文学研究需要一种创新，正如比较文学学者贝达德和托马斯(Ali Behdad & Dominic Thomas)在讨论当下文学研究时提出如下疑问：“我们如何比较分析在全球离散与跨国的场域中生产的文学产品，以及那些在不同地域间循环移居的跨国作家所生产的，将叙事置于多样化地理场所的作品？”^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在既有的离散与后殖民理论的前提下再往前推进一步，超越离散文学批评的文化身份认同执念^②，超越后殖民文学批评单一的抵抗逻辑^③，为新语境下的世界华人文学提供一个更贴合的批评理论选择，即跨国主义批评(transnationalism)。

一、跨国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20 世纪末，在互联网加持下，交通、通信、传媒等领域的迅速发展，使冷战时期即已在两大对立阵营内部各自形成的跨国的金融、文化、移民、学术网络等，突破了铁幕的限制，扩展到全球范围，从而形成冲击人们生活方式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1&ZD282。

作者单位：上海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跨国网络。各种新型移民应运而生,移民的身份认同也不再是在故土和移居国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不断做动态调整。王爱华(Aihwa Ong)将之称为“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④,社会科学界为认识这一新现象而提出“跨国主义”理论。^⑤这个理论突破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单维认知框架的束缚,带来认识论、知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新发展,其理论本身也经历了不断补充完善的过程。

美国学者波尔恩(Randolph S. Bourne, 1886-1918)于1916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撰文《跨越国家的美国》(*Trans-National America*),对当时流行的有关移民同化的“熔炉”理论(melting pot)提出质疑。他认为,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其持续不断的跨国/跨民族流动,美国是一个由不同民族和文化组成的“超越(trans)国家局限的美国”。^⑥这个判断已有当代跨国主义思想的雏形,但受限于时代的发展,波尔恩的跨国只体现了彼时美国的移民文化特征,缺乏交通、通讯和资本流动等各种充满活力的跨国形态的有力支撑。

当代跨国主义理论诞生于1990年代,即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迅速发展时期。琳达·贝丝(Linda Basch)等研究拉丁裔移民的学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先进的交通和通讯技术带来一种新式移民,这类移民同时在两个国家建立家园,其日常生活依赖于跨越国界的多重性的和经常性的相互联系,其公民身份在各国构建,彼此并不矛盾,反而相互加强,过去社会科学中的离散等相关理论显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因此她们采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社会场域理论”(social field)作为分析工具,提出“跨国主义”一说,并将之界定为“由移民打造并维护的,用于联结他们的母国和移居国社会的共时的多股绞合的社会关系的过程……并因此而建立一种跨越地理、文化和政治领域的社会场域”。^⑦国家间的政治边界被新技术提供的通信与交通技术模糊化,自由便捷的跨国往返或实时的“虚拟跨国”通讯联结成为一种生存状态。新理论抛弃传统的“民族—国家”中心范式,从更广阔的全球视角研究族群和文化的跨国流动现象,对学界之前习以为常的有关移民的文化熔炉论、身份焦虑论、

认同困惑论等提出不同看法。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韦尔托韦茨(Steven Vertovec)进一步扩展了跨国主义的内涵,认为跨国主义泛指全球化时代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将人或机构联系起来的多种纽带和互动。这种“纽带和互动”恰恰是社会场域的重要特征。韦尔托韦茨理论的最大贡献是对跨国主义的类型划分,他指出学界的跨国主义概念通常包含如下6种类型:一种社会形态(social morphology)、一种意识类型(type of consciousness)、一种文化再生产模式(mode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一种资本流通渠道(avenue of capital)、一种政治参与场所(site of political engagement)、一种属地性的重构((Re)construction of ‘place’ or locality)。^⑧韦尔托韦茨特别强调移居者去中心的双重或多重的跨国身份意识,他们不以融入移居国为目标,而是游走于两个社会、两种文化之间,从而把移民所面临的夹缝生存状态转变为具有积极意义的灵活的跨国实践。他对跨国主义所做的这6种分型为华人文学研究提供了便捷的分析维度,如在跨国资本流动基础上产生的跨国社会形态、跨国意识类型、跨国文化再生产模式、跨国属地性的重构等。

德国政治学家费斯特(Thomas Faist)等人认为,移民通过跨国行为和跨国网络构建出一个共融的社会空间(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这里的空间不仅指地理特性,也指某个特定地方呈现给移民的更大的机会体系、社会生活、主观意象、价值和意义,它包括或超越各种领土性的区域,具有一种超越单纯领土的社会意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性或象征性联系,空间才对潜在的移民有意义。”^⑨费斯特的分析较多借用的是布迪厄的资本概念,即跨国社会场域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各种资本的数量积累、使用效果以及资本间相互的转换关系,资本的总量与交换频率决定跨国空间的活力,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跨国资本网络分析框架成为跨国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突破。费斯特的新颖之处在于非实体的跨国空间与象征性联系的提出。象征性联系可以是文化的、身份的、意识的,这为跨国主义进入文学批评提供了重要的逻辑演进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跨国主义和二战后兴起的

“离散”理论(Diaspora)在当下处于交叉共存的局面,因为二者的研究对象在当下基本重叠。离散的基本词义指离开一个中心到其他地方生根从而扩大种群。经典离散是一种“受害者离散”(victim diaspora),即故土发生创伤性事件,从而使其人民被迫遣散到两个甚至更多的外国移居地。起初离散研究只关注散布于全球的犹太人,二战期间犹太人所遭受的种族大屠杀,使离散研究在战后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离散研究目标对象也从犹太人逐渐转向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多个种族群体,如印度人、中国人、巴勒斯坦人等。以罗宾·柯恩(Robin Cohn)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主要关注离散的历史发展、地理分布、社团组织方式、经济实践等,属于外部研究。^⑩社会学派的离散研究在当下与跨国主义已形成视域融合,只是比跨国主义研究更关注移居者和故土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宿主文化中面对的问题。相比而言,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2014)为代表的离散研究的文化学派大体属于内部研究,主要关注离散群体的文化实践和身份认同。正是文化学派的离散研究凸显了其于跨国主义的区别,因为文化研究的离散理论关注的是种族与文化对离散者身份建构的奠基作用,而这两者均具有相当程度的排他性,与跨国主义试图对这两者的超越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⑪

犹太离散群体因巨大种族创伤而推动的战后离散研究,皆以种族文化实践为核心,关注族群的历史与文化遗产,关注以种族和宗教为基础建立离散群体的身份认同和“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理论看起来百家争鸣,但本质上都具有相当的文化排他性,与种族主义二元对立思维较为相似,只是诉求有别。与之不同的是,伴随全球化而诞生的跨国主义,则淡化对种族历史创伤的执念,更多关注非犹太群体在全球逐资本而流动的现象,关注移民的趋利性选择与跨越国家疆界的共时性生存样态。这样的理论必然关注移民为争取最有利的生存资源而形成的双重或多重国家认同,也会关注在故土与移居国之间自由流转产生的双边活力。既然社会学领域的离散研究能够发展为重要的文化研究理论,并进入后现代文学批评,那么同样源自社会科学界以解读全

球化的跨国主义,又如何与世界华人文学批评进行学理对接呢?

二、跨国主义与跨国文学研究的契合

跨国的文学研究其实早已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索罗斯(Werner Sollors)在1990年代末就尝试用新产生的跨国主义概念将移民以各种语言书写并主要在海外出版的族裔文学纳入美国文学的研究框架。^⑫进入本世纪,跨学科的“美国研究”(American Studies)推动了跨国主义在各领域的发展,费希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2004年就任美国研究学会主席的演说《文化的交叉点:美国研究的跨国转向》(Crossroads of Culture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主要以其从事的马克·吐温研究为例,从马克·吐温作品中的跨国空间,马克·吐温研究的跨国学术网络等诸多角度和层次,论证了美国文学跨国主义研究的必要性以及跨国主义转向的学理合法性。^⑬保罗·杰伊(Paul Jay)出版了专著《文学研究中的跨国转向》(Global Matter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2010),专门讨论为什么以及如何从跨国视角研究当下的文学新趋势。^⑭那么跨国主义的哪些理论品性契合全球化语境下的跨国文学研究?

第一个契合点是文化层面的平等立场。跨国主义本质上是对一个跨国场域的描述与分析,场域中的个体在文化认同上不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做叠加。他们对全球化背景中生发的一切都从故土和移居国两个端点去平衡,在霸权主义曾经强推的文化同化论和表面宽容实质抽空族裔文化内涵的多元文化主义之外有了第三种选择。文化平等策略背后是“本土兼全球”(glocalism)的二律背反逻辑,其文化认同是一个去地域禁锢(deterritorialization)的做加法过程。跨国空间中的个体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译者,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跨国即翻译”(To be transnational is to be translational)。“胜任的译者”会在最短时间发现故土文化与宿主文化间的双向“可译性”,即两种精神现象间可以沟通的部分,由此为自己找到落脚点。在“胜任的译者”的桥梁作用推动下,两种文化互相进入对方,从而形成本雅明展望的“更丰富的语言”(greater language)。^⑮

文化平等立场是跨国主义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学批评的前提。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全球化的文学生产、流通与后续的作品研究,需要超越民族中心主义思维。当下文学的跨国与跨文化书写已成为一种读者和评论界都能接受的书写形态,跨国流动的作家群体在世界范围内声誉鹊起,例如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 1899–1977)、奈保尔(Vidiadhar Naipaul, 1932–2018)、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等,其中多人获得世界级奖项。这些作家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故国与移居国间的多层面对话,作为这种思想对话的文学作品不适合纳入以单一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框架。具体到世界华人文学,获得广泛认可的华人作家都是成功的文化译者,懂得如何通过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等多种翻译技能,创造文化的可译性,将中华文化作为一种文本译介给更广泛的读者群,如谭恩美(Amy Tan)、裘小龙(Qiu Xiaolong)等一众华人英语作家用英美的主流文类和叙事方式呈现中国的新旧伦理变化。聂华苓、於梨华、陈谦、张翎等汉语作家则在不断切换的跨国叙事场景中进行中外文化的互识与对话。跨国主义肯定全球化时代文化存在方式与审美方式的多元与宽容,有助于展示世界华人文学丰富的文化声部和色彩。

跨国主义与跨国文学研究的第二个契合点是对双向流动性的关注,这是文化平等观的学术实践。跨国行为主体的循环流动带来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越界交换,在各种社会性的和象征性的联系加持下,形成一个有活力的动态空间。没有流动性就没有跨国的能量流,就无法维持和推动跨国空间的内部活力,正是这种跨国流动性改变了文学的叙事版图、空间地理、价值取向和叙事风格。詹姆斯·阿尼斯里(James Annesley)的专著《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2006)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⑥以作家为载体的流动性产生了思想和理论的旅行,在文学作品中展示价值冲突,并促成文学间的互相影响。

流动性最明显体现在华人文学叙事空间的全球切换。叙事往往穿越从北美到南美,到太平洋岛屿,到澳大利亚,到东南亚,到东亚,到南亚,到欧洲的巨大跨国空间,标识出遍布全球

的华人跨国网络。产生于这个空间并反映这个空间的文学,必然跨越国家的疆界去想象现代华人的生存经验和全球身份,这在国际犯罪小说、财经小说等类型化文学形式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真实物理空间切换的同时,跨国华人也通过互联网保持实时联系,巨大的实时地理空间被虚拟性压缩。这在美国华裔英语作家关本安(Kevin Kwan)的系列小说中表现尤为突出。

流动性同样对作家研究产生影响。传统文学研究是基于作家国籍、年代和居住地的三维认知矩阵,受跨国流动影响,这一矩阵现如今的阐释力大大下降。

流动性还涉及文学的跨国生产方式。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书写、出版、流通,以及后续的阅读、翻译、影视多媒体改编、学术研究等都是跨国的,具有市场潜力的作品几乎在全球同步发行,并针对不同国家的受众改变文学产品的呈现方式,陈谦、张翎等华人作家始终和中国、新加坡等主要华语文化区的出版体系保持联系,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保持接触。从场域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跨国文学场域,是一个以文学产品为核心的关系网络,而且这个网络是跨语系的跨多国存在,如美国华人的汉语文学可能在美国出版发行,也可能在中国、东南亚国家出版、流通、评奖和研究,是语系概念上的跨(多)国与跨(多)文化,正如里·普莱斯(Leah Price)所言,学界有必要研究“书籍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book)^⑦。

流动性也产生跨国主义与跨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个契合点,那就是对网络化关联的强调,这是超文本研究。资本和人员在跨国场域中的流动,彼此结成象征性与功能性联系,交织成一个跨国网络,参与跨国行为的作者和译者、出版机构、销售机构、学术机构等,是这网络中的一个节点。族裔作家的成功往往取决于他所能激活的跨国节点的多少,即他在两个甚至更多国家和地区所能调动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对跨国网络的节点分析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一个族裔作家的语际沟通能力,寻求文化间的价值共通能力,在不同语系范围内的

社会资源调配能力,决定了作品关注问题的视野、广度和深度,间接影响作品在语系内和文化圈内所能获得的反响总量。作家本人所拥有的跨国网络节点在他的作品出版、发行、阅读、研究和经典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网络化研究方法可以更清晰呈现作家作品在跨国语境中的力学结构,即外部双文化语境和作者内在诉求之间的张力以及张力的变化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影响。譬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Moments in Peking*, 1938)等系列英文小说回译进汉语语境后的接受与影响,如果用网络研究法绘制其演变图谱,脉络会更清晰。

跨国主义理论肇始于以移民为特色的美国,并迅速被各学科认可。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助推了这一理论的影响力,也影响了文学研究在新语境下的反思和转型。从历史发展来看,跨国影响对多民族国家的文学的形成、发展与经典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麦思默(Marietta Messmer)从美国文学史的编撰史切入,指出跨国性与多语性对美国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⑧;翟理斯(Paul Giles)深入美国经典文学的思想深处,分析梭罗等人的思想如何跨越大西洋和欧洲的人文思想发生碰撞^⑨;博格斯(Colleen G. Boggs)以跨国主义视角梳理了1773-1892年之间美国文学译介活动对早期美国文学发展所起的作用^⑩;拉马扎尼(Jahan Ramazani)的《跨国诗学》(*A Transnational Poetics*, 2009)是跨国主义用于当下美国文学批评实践的典范,作者按照全球化、移民、旅行、流派、影响、非殖民化、离散等各种类型的跨国表现展开论述,阐明现代英语诗歌溢出国家边界后产生的超越民族文学范畴的多种影响方式。^⑪所有这些开拓性研究都体现了文化间相互作用的平等原则、采用相当复杂的网络化多维分析方法,展示流动性对国别文学发展的影响。

三、跨国主义之于世界华人文学批评

处于跨国空间中的海外华人文学在进行文化翻译的同时,又不断进行文化杂糅,是典型的跨文化和跨语言产品:文学生产者的生活和工作场所是跨国的,他们的生命体验与文化实践是跨国的,书籍的出版与阅读是跨国的,文学叙事空间的转换也是跨国的。基于民族文学

闭环想象的文学批评与华人文学的现实之间形成一定的解读错位,因此与华人文学跨国性相一致的批评建构已成为时代的必要。那么以跨国主义理论立场切入华人文学研究,可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呢?

(一)跨国主义之于华人文学批评的适用性之辩

以潘志明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基于对美国二代华裔的英语作品解读,认为跨国主义批评不适合华裔英语文学研究,原因在于当代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学想象与华裔美国历史经验之间是断裂的,作品呈现的不是有关跨越和穿越边境的活动的连续不断的叙事,而是设法断绝与中国的联系,呈现移民急于融入美国的国家构想,因此当代华裔美国文学并非跨国主义文学,跨国主义的华裔美国文学批评是没有批评对象的批评话语。^⑫这里可以看出,潘老师过度拘泥于跨国主义的物理层面,有失偏颇。跨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从社会学进入文学研究,不只是一个描述具体空间位移的名词,而是一种系统的研究作品的视野与方法论,即前文所论及的跨国主义理论品性对全球化新语境中文学研究的启发。

费斯特在谈论跨国空间时曾经指出,构成跨国网络的可以是具体的联系,也可以是象征性联系。^⑬这种象征性联系可以是文化实践、文化想象或某种执念(obsession)。在潘志明作为例证的伍慧明(F. M. Ng)的《骨》(*Bone*, 1993)中,三个女儿的确一直抗拒和中国有关的一切,她们也没有到过中国,但她们对中国文化的抵抗本身就已形成一个张力空间,一个跨国的文化空间,一种实时的对位性反思。跨国的形式可以是主动接受某一文化,也可以是抗拒某一文化。正因为三个女儿对父母的中国文化的抵抗让读者看到唐人街的芸芸众生如何挣扎在一个从物理到心理的中美跨国空间中,看到中国文化如何渗透到华裔的骨子里,甚至连死亡都无法消解这种占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无法用文化平等的视角进行自我反思与接受,悲剧则必然无法避免。在潘志明作为例证的任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7)中,中国文化也是以子女抗拒的方式被悖论性固定下来,从而形成象征性的张力强大

的跨国文化空间。

另一方面,潘老师不断提及二代华裔作家们在 1970 年代“声明美国身份”(claim America),以佐证跨国主义的理论局限。这样的判断不仅罔顾了口号的政治性权宜,而且忽略了跨国主义深层的文化内涵,将跨国主义风干成空间位移的同义词,并以此置换用于文学批评的跨国主义。退一步说,身份政治实践其实仍然无法避开跨国主义。这场二代身份运动诞生于冷战高潮期间,此时的华裔出于获得安全稳定的生存考虑,没有建立中美双重认同(double identification)的政治选择。岂不说冷战时期中美政治对抗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华裔们在微观层面同中国大陆的亲戚朋友建立通信联系都很难。此时,异质性鲜明的唐人街中国文化已僵如化石,不仅不能提供有源头活力的文化力量,而且打乱了华裔孩子的“熔炉论”美国身份认知,造成认同焦虑。“声明美国身份”是一种生存策略,但实际上也同样悖论性地巩固了跨国的文化心理空间,就像华裔作家赵建秀(Frank Chin, 1940-)的小说和戏剧所展示的那样,抵抗越强烈,这个张力空间就越牢固。当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使双重认同变得有利,曾经的运动领导者和参与者都迅速恢复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曾经刻意强调自己为“美国作家”的书写者,如今很愿意说自己是“华人”美国作家。还应该看到的是,冷战期间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采取的“遏制”(containment)政策使美国华人不敢和中国大陆有联系,但美国政府对部分亚洲国家采取的“融合”(integration)政策却使美国华人同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的华人的联系增加,这也是一张范围广泛的华人跨国网络。

母语为汉语的移民用汉语为中国读者书写海外,或者用移居国语言为移居国读者书写中国,更多是出于市场和政治安全的考量。外语书写因移居国政治生态而一言难尽的地方,正是用汉语书写开始的地方。如果将华人族群看作一个整体,这两类相向而行的书写就构成一个良好的文学跨国空间,而在海外出生的华人作家的外语书写则正好居于二者之间,他们是为自己这个族裔群体本身而写,对移居国和祖籍国的文化具有双向反思性。潘志明作为证据提出的 1960 年代后期到 1990 年代初华裔作家

试图对唐人街文化做断根处理,但坐落在美国的唐人街却是一个实打实的跨文化空间,只是彼时因为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文化与人口源流而缺乏活力。1990 年代之后因为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之一,唐人街的跨国空间重新焕发活力,资源更加丰饶。以《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为标志,1990 年代之后海外华人的外语书写中的跨国场景切换也更加频繁。

(二)跨国空间中的作家与作品研究

世界华人文学可以分为汉语和非汉语两大类,但华人作家的类型则比较复杂,至少可以分为三种。首先是坚持用汉语书写的移民作家,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张翎、虹影、黄运基、陈若曦等,他们的目标读者主要在华语语系圈内。有趣的是,尽管他们有中国和移居国的双视角,他们却主要承担一种逆向的信息提供者角色,即向汉语读者提供从欧美国家历史教科书中看不到的普通移民的日常生活与历史记忆。即使擅长在不断切换的跨国叙事场景中发展情节的汉语作家陈谦,其故事主场也仍然在美国,人物也是移民美国的专业人士以及他们的中产阶级交往圈。

第二种指的是母语为汉语却用移居国语言书写的移民作家,赵毅衡将他们称为获得语作家(writers of acquired language),^②如林语堂、黎锦扬、包柏漪、哈金、李翊云、裘小龙、凌叔华、韩素音、萧锦荣等。获得语作家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以书写为媒介回首中华故国。这是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经历形成的优势,当然也是一个被阅读市场刻板化的优势。他们被认为是第三世界本土信息的权威提供者而被推崇。他们用外语书写中国如同架设一座文化桥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方方面面。如果不将他们的书写置放于跨国的两个文化、文学和政治传统中,对他们的理解就不完整。仅以单维的中国或移居国价值框架解读,不仅有误读,而且削弱了作品的文学价值,阻断了更为重要的文化交流功效,不利于中国文化话语的世界性建构。

第三种是海外出生且只用所在国语言写作的华人作家,如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 1940-)、谭恩美(Amy Tan, 1952-)、黄哲伦(Henry David Hwang, 1957-)、任碧莲(Gish Jen, 1955-)、伍绮诗(Celeste Ng)、伍慧明等。他们虽用英语

写作,但因其肤色,无可逃避地被阅读市场归为异域信息提供者之列,不得不书写华人文化。他们在海外主流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框架下反思和评估祖辈带到海外的中国文化。他们不存在对祖籍国的怀旧的渴望,往往以局外人的冷眼进行剖析,譬如汤亭亭的《中国佬》(*China Men*, 1980),谭恩美的《灶王娘娘》(*Kitchen God's Wife*, 1991),伍慧明的《骨》(*Bone*, 1993)等。

生存于跨国空间中的族裔书写主体,在语言或文化上不可避免与移居国的其他公民保持距离,同时也与故土家园产生疏离,这种文化疏离立场让他们拥有独特的视角、叙述优势和保全策略,使他们有可能在叙述中修正双边主流书写都有意屏蔽的经验,让历史上被噤声的那部分发出声音,在官版的历史之外提供一个相对独立的也许更贴近真实的民间版本。这种双端视点和球幕视野使跨国书写倾向于通过隐喻性和寓言性的叙述,将可能被禁言的东西保留在跨国空间中,通过个人记忆和诠释的碎片,帮助特定阶级、族群和性别将其具体经历记录下来,而这样的记录在双边的公共记忆管控中常常是被清除、遗忘或忽略的。换句话说,跨国书写具有“反记忆”(counter-memory)功能,潜在地修正双边历史与集体记忆中因档案损毁、不全或禁止查阅所导致的公共记忆断裂。融合双边文学中各具特色的诗学传统,发现被遗忘的话语方式和表述结构,依靠双向边缘化提供的安全空间,让几近湮灭的个人与集体叙事重回历史,这是跨国的华人文学的特殊意义所在。

然而这种双向疏离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的作品通常被两个国家的文学经典化排除在外。他们的跨国书写,除非像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严歌苓的《扶桑》等最终被译介进英语文学的作品,他们的汉语书写多数没有被移居国的文学数据库收入,对于这种非英语的书写能否归入移居国文学,一直存在学术争论。如前所述,索罗斯早在1998年就已提倡建立多语种美国文学,但编写文集谈何容易。那本收集华人在天使岛移民拘留所墙上所写诗歌的《埃仑诗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 1982),

需要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等众多华人学者协力花费多年才完成翻译和编辑出版。

在欧美国家,“族裔文学”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主流与非主流二元对立思维所张贴的,将其定性为某种在移居国历史中建构起来的终将被主流消弭的临时性书写传统,与此同时,对于中国文学史来说,海外华人的非汉语书写,不管其内容如何,书写者是谁,翻译得如何传神,都无法被接纳进中国文学史框架内,譬如几乎所有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都见不到林语堂用英语书写的中国小说的详细介绍,而事实上他的几乎所有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的英语小说都已译成中文,他在中国文学史中似乎被定格于他的闲适派汉语书写。另一方面,即便移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在移居国用汉语书写,因为民族主义的学术思路,这些作品也往往被中国文学史和学术批评边缘化,如清瘦而孤悬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海外华人文学”类别。

相比于流亡文学研究特别关注作品的无根漂泊意识和流亡作家的精英意识,^⑤相比于离散文学研究特别关注作家本人或作品中人物的文化身份认同,跨国主义对身份问题并不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倾向于对文化身份做非融合的叠加。在跨国主义学术定位中,双边文化在个体的文化认同中并不冲突,甚至彼此依托,文化身份可以灵活调整。全球化时代的跨国书写基本超越了文化身份的本真性迷思,在选题或隐喻意义上关注更宏大更具全球性的外部话题,如恐怖主义、全球生态、性别平等、均衡发展等。从这一层面上说,跨国主义更适合冷战结束后,多元文化主义得到普及,海外华人落地生根思想得到广泛认可的21世纪华人文学作品的批评建构。

(三)流动的华人文学跨国空间研究

在世界华人文学中,无论是移民回首故国的外文书写、揭示海外生活的汉语书写,还是二代华人做文化双向反思的外文书写,叙事场景总是在中国、移居国以及世界各地华人聚居区之间不断游走。华人文学叙事几乎不出现欧美传统“家庭小说”(domestic fiction)那种以家庭或小社区为背景的静态叙事。仅看华人作家汤亭亭的《中国佬》(*China Men*, 1980),邝丽莎的《上海女孩》(*Shanghai Girls*, 2009),谭恩美的

《喜福会》,以及聂华苓、於梨华、张系国、白先勇所代表的六、七十年代“无根的一代”留学生文学的汉语书写,就能看到华人文学广阔的跨国流动性。

阿卜杜拉(Arjun Appadurai)曾经提出过“本土性的全球化生产”(global production of locality)的概念,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着眼于宏观政治经济的交流与网络,本土性(locality)立足于文化创造和抵制,但本土性却依靠全球化的流动网络走向世界,造成各种文化本土主义和文化基要主义在海外蓬勃发展。^⑤这一点对跨国主义的文学叙事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全球与本土互相推动,也互相消解,构成巨大的现代文明张力,当下的文明进程就在这个张力面上展开。在文学的书写、出版、流通、翻译、研究的全球化的同时,文学叙事本身在不断凸显本土文化。相当多的华人文学作品,都通过跨国叙事探讨全球化和故土文化之间的悖论性依附关系。

华人文学还通过不断的跨国场景切换,将国家大历史微缩为个人的小历史,具有较强的隐喻性。以聂华苓用汉语创作的《桑青与桃红》为例,故事在刻意制造的荒诞中不断进行跨国回闪——长江扁舟、北京大院、台湾眷村、州际公路、汽车旅馆,场景似乎永不停息地变化。美国的桃红与中国的桑青,既分裂又统一。时而躲躲藏藏,压抑低回,这是不断逃难的桑青的心路历程;时而疯疯癫癫,激越躁狂,这是焦躁不安的桃红的自我言说。空间的切换也是历史的切换,抗战、内战、撤台、留美等等,历史的颠沛流离与桃红的美国流亡场景形成对位。陈谦的当下作品也属于这一类型,例如在她 2015 年书写硅谷华人的小说《无穷镜》中,场景在中美之间快速切换,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始终保持在场,并实时影响人物的各种人生选择。正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 1934-)所说,“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文本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⑥在美国被第三世界化的华人文学显然都有明显的

历史隐喻,对跨国叙事空间的分析也有助于加强对历史纵深的了解。

华人跨国书写还呈现另一种类型,即通过跨国场景的切换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群连接成一张宽广的跨国网络,如从新加坡赴美的关本安的畅销书《疯狂的亚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2013),将美国、英国、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ies),通过华人资本链的方式密织为一张广阔的华人跨国网络。

关注场景的跨国切换,有助于了解跨国空间的建构方式,了解全球化在政治经济领域之外对人文生态的影响以及人文层面对全球化的回应方式,了解包括直接参与跨国流动或未参与却与跨国流动相关的人群的生存样态,由此承担起文学的社会关怀责任,让个体的现状被看到,需求被听到。另一方面,对文学作品中的跨国空间分析,有助于揭示故国与移居国的大历史如何被空间化为个人小历史,继而通过个体生命史的反记忆功能,修正被双边主流记忆摒弃在外的声音。

(四) 华人文学的跨国出版与研究

如果有人问:美国或法国华人文学在哪里生产?也许多数人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在美国或法国。然而,对于欧美有大量移民的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版图与语言版图并不叠合。世界华人文学从来就是多语种的存在,相当多的华人作家能用两种及以上语言书写,因此文学产地与市场也就颇为复杂。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实时交流已成可能,各种跨国联系增强,华人作家虚拟与真实的活动空间也广袤而变动不居,其文学产品可能在美国、英国、欧盟、东南亚、中国或者其它有较大华人群体的国家同时出版流通,有全球性发行网络。

使用英语的华人作家的作品通过出版达拉斯在英语区同步发售,对于以汉语书写的华人文学作品,出于成本与贴近受众群的考虑,往往在中国或者汉语语系国家内出版,例如白先勇的《纽约客》、张翎的《阵痛》、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陈谦的《无穷镜》等,都首先在华语区出版,但这些经典之作都是在北美写就的。这些汉语书写者得益于全球化语境下超国家层面的文化流通,

也表征着文学与跨国主义的紧密关系。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等学者目前力推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这实际上依赖的正是蓬勃发展的跨国书写与出版体系^③,这个出版体系与华人作家本人以及同一语系内的研究者组成越来越紧密的文学跨国网络体系。

除了考虑华人文学书写语言的多样性以外,还要考虑翻译的因素。目前英语的华人文学经典作品基本都能找到汉语译本。不少学者通过中译本了解汤亭亭、赵建秀、谭恩美、邝丽莎、伍绮诗的文学书写,讨论他们的文化翻译;而林语堂、哈金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译本的读者可能远多于美国的英语读者。从内容上说,这些译作几乎是彻彻底底回译进汉语的中国文学,那么这些中译本能否归类为中国文学?

此外,文化翻译问题又该如何处理?该保留其面向英语读者而对中国文化词汇所做的改变,还是用地道的中国文化词汇翻译,让其译作读不出洋味?考虑到同一语系内政体的差异,不同译本受到不同意识形态的操控,因此译本往往存在相当的区别。即便是汉语文本,在同一汉语语系内,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因为受众文化与政治环境的差别而存在版本差异,譬如《桑青与桃红》存在四五个不同汉语版本,可以成为版本研究的经典案例。

总体而言,华人文学因其文化内容的多元杂糅性,文学传统的多源头融合,其阅读受众面广而跨国,出版与流通的商业机制也必然反映和顺应这一内在的跨国性。当华人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进入全球性书写样态,其存在不再拘泥于单一的文学系统中,而主动与多个不同的文学传统和体系融合、杂糅,在多个文化传统中游走,从而变得丰盈而更有生命力,相应的研究也必然要超出文学本体,关注内容之外的超文学的外部研究。

四、结语:跨国主义的华人文学批评建构的意义

可以说,多元文化主义、后殖民文学研究同全球化研究产生的交集点,正是世界华人文学的跨国主义批评建构的起点,尤其是上世纪后期后殖民文学研究以语系文学的分类形式打通了前宗主国和前殖民地的文学研究,提供

了在跨国语境中研究文学和文化的框架,但后殖民文学批评本质上是以德里达与福柯的理论体系为掩体而发动的话语革命与认知范式革命,针对的目标是建立殖民合理性的西方“元叙事”(meta narrative),而文学的跨国主义批评则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出发,真实地介入社会,其批评目标是沿着跨国流动环路,建立文化对话机制与网络型互动机制,反对边缘与中心的二元对抗机制。更具体地说,跨国主义的文学批评以作家的流动性、叙事空间的跨国变动、翻译与出版网络等几个方面为主要批评维度,切入从文学文本到超文本的文学体系,具有很强的可调适性与可操作性,能深化语系文学研究,揭示文学跨国流动的动力机制,化解后殖民批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批评困境。

将语言与主题版图复杂的世界华人文学置放于开放的跨国空间开展研究,可以避免西方文论对非西方文化无知造成的解读偏执,也可避免这种偏执性解读对开放型族裔身份建构的伤害,进而影响学界的学术思想多元,例如用传统的美国男性气质标准套用于强调“知书达理”的华人男性气质,结果显然相当不堪,这成为了赵建秀(Frank Chin)、徐忠雄(Shawn Wong)等华裔男性作家无法解脱的执念,这种执念实际上遏制了他们对题材的选择,最终扼杀了他们的文学才能。在中国传统男性气质建构中,谋略与内敛等智性特征处于核心地位,彪悍和粗犷的气质则等而下之,因为聪慧和持重意味着可以在科举考试中胜出并在社会阶梯上稳步上升,获得远超强壮身体与张扬个性所能获得的更为丰富的资源。学者张敬珏(King-Kok Cheung)提出,书生气才是中国传统男性气质的核心。^④这是在中外两种文化激荡的跨国空间中产生且符合现实的学术话语,而这种理性克己的书生型阳刚理念在汤亭亭的《中国佬》、邝丽莎的《上海女孩》《牡丹》等一众书写中处于相当鲜明的位置。

当然,跨国的学术活动也应属于文学的跨国主义批评范畴之内。华人文学不可避免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和民族国家传统,文本中记述的任何历史都牵涉两个或更多国家,需要从各参与国查找相关资料,以此全面了解一次历史事件,让文本性的历史贴近事实层面。为了

实现这一目的,就有必要建立本领域内研究者的互动合作网络,譬如针对美国华人英语文学的研究,中国学者可以贡献华语区的文化视角与丰厚的文化资料,美国学者可以贡献美国的视角与文论,从而形成有效的跨国互动和资料分享,发现新的研究点,深化这一领域。

再从国家形象对外宣传策略来看,海外华人的外语书写和汉语书写的外译可以成为中国外宣中的重要两环。很多国家在扩大国际影响力时,都会设立本国经典外译项目,但经典

书单的选择一般相对主观,无法在做决定之前准确预测目的语国家读者的接受程度,因此多年的实践证明效果并不好,而华人文学对两种文化进行交叉来回对比书写,可以让目的语国家的读者有更深刻的跨文化认知,避免被动灌输产生的心理抵抗。每一部被经典化的华人文学作品,对故国文化输出的贡献都是巨大的。因此,对华人文学从跨国空间的双向角度研究,有助于总结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的策略,为中国话语建设作出贡献。

- ① Behdad, Ali, Thomas, Dominic. *A Compan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hichester, UK: Wiley Blackwell, 2011, p.7.
- ② 赵文书:《反思华美文学的流散批评》,《外语研究》2012 年第 2 期;张冲:《散居族裔批评与美国华人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2005 年第 2 期;陈爱敏:《流散书写与民族认同——兼谈美国华裔流散文学中的民族认同》,《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 年第 2 期。
- ③ 张义:《后殖民语境下美国华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与身份建构》,《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 3 期。
- ④ Ong, Aihwa.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⑤ nation 既可以译为“国家”,也可以译为“民族”,因此有译者将 Transnationalism 译为“跨民族主义”(见金衡山:《美国文学研究中的跨民族视角》,《国外文学》2009 年第 3 期,第 11-19 页。),这取决于使用者的视角和政治立场,毕竟当今世界上单一民族国家较少。在多民族国家中,个体的民族身份、文化身份、语言身份往往并不叠合,所以身份切换是一种生存样态。相比而言,“国家”因其主权政治的第一属性,而具有更博大的空间涵纳能力。此外,在全球化语境下讨论的“移民”,一般指跨越国家间政治边界的国际移民,而非一国之内出于生计需要而产生的区域移民,所以社会科学界一般都将 Transnationalism 译为“跨国主义”(丁月牙:《论跨国主义及其理论贡献》,《民族研究》2012 年第 3 期,第 1-12 页。),尽管文学与文化研究更倾向于关注个体的民族文化,但作为批评术语,概念的覆盖面、区分度、明晰度应予以重点考虑。比之“跨民族主义”,“跨国主义”可以将“超民族”的因素包括进来,概念明晰,更适合讨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发展,更具有阐释性。
- ⑥ Bourne, Randolph. Trans-National America.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118, No. 1(1916), pp.86-97.
- ⑦ Basch, Linda et al.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states*. Langhorne: Gordon and Breach, 1994, p.7.
- ⑧ Vertovec, Steven.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p.4-13.
- ⑨ Faist, Thomas. *The Volume and Dynamic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5-46.
- ⑩ Cohen, Robi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17. 社会学派提出的离散分类对离散研究的层层深入起了重要作用,主要类型如下:(1)受害者离散(victim diasporas,如犹太人、亚美尼亚人、爱尔兰人、非洲黑人等的离散);(2)劳工离散(labor diasporas,如迁移到世界各地的南亚劳工群体等);(3)帝国离散(imperial diasporas,如从欧洲殖民帝国移居殖民地的白人族裔);(4)商贸离散(trade and business diasporas,如到东南亚经商定居的华人和亚欧各地的黎巴嫩人等);(5)祛故土化多重离散(deterritorialized diasporas,如非裔加勒比人在欧美的离散、黑人环大西洋离散等)等。
- ⑪ 朱骅:《离散研究的学术图谱与理论危机》,《世界民族》2018 年第 3 期。
- ⑫ Sollors, Werner. *Multilingual America: Transnationalism, Ethnicity, and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8.
- ⑬ Fishkin, Shelley Fisher. Crossroads of Culture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 *American Quarterly* Vol.57, No.1(2005), pp.17-57.
- ⑭ Jay, Paul. *Global Matters: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Literary Studi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 ⑮ Benjamin, Walter.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Hannah Arendt. Ed.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1969, pp.69-82.
- ⑯ Annesley, James. *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2006.

- ①⑦ Price, Leah. *Elegant Extracts*.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2, No.3(2000), pp.26-28.
- ①⑧ Messmer, Marietta. *Toward a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or Interrogating the Boundaries in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ies of North American Literature*. *PLMA* Vol.118, No.1(2003), pp.41-55.
- ①⑨ Giles, Paul. *Transnationalism and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PMLA* Vol.118, No.1(2003), pp.62-77.
- ②⑩ Boggs, Colleen G. *Transnationalis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1773-1892*.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 ②⑪ Ramazani, Jahan. *A Transnational Poetic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②⑫ 潘志明:《跨国主义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之我见》,《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
- ②⑬ Faist, Thomas. *The Volume and Dynamic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45-46.
- ②⑭ 赵毅衡:《三层茧内:华人小说的题材自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②⑮ 朱骅:《流亡文学的本体论思考》,《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 ②⑯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 1996.
- ②⑰ [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 ②⑱ 王德威:《华语语系文学:边界想象与越界建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 ②⑲ Cheung, King-Kok.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without Borders: Gender, Genre, and For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67.

(特约编辑:江涛)

Transnationalism as Critical Construction for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Zhu Hua and Huang Xu

Abstract: To describe and understand new forms of immigration in an era of digital communication and convenient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cholars in social science propose a timely theory of transnationalism, which stresses cultural equality, mobility and network analysis. Such theory is in good accord with the studies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nationalism helps scholars remap the transnation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flexible citizenship and worldwide shifts of scenes in global narrations. Transnationalism can also promot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multi-lingual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stablish a network of trans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Transnationalism embod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and a critical turn to the very reality of the current world.

Keywords: World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nationalism, transnational space, flexible citizenship, cultural community

(English Translator: Zhu Hua and Huang Xu)